

交換心得

學生出席國際學術活動及海外實習交換獎學金

吳子勤 R12850007

健康行為與社區科學研究所

來到北京師範大學交換後，我逐漸意識到，自己在申請交換時所關注的「愛滋治理」、「身分揭露」與「制度差異」，並不是只能透過正式研究才能理解的議題，而是在日常生活中不斷被經驗、被撞見的現實。如果說我在台灣的研究訓練，習慣將「個人」視為行動者，透過社會網絡、醫病互動與制度縫隙協商自身位置，那麼在中國的交換經驗，則讓我更強烈地感受到另一種治理邏輯：個人不再只是行動者，而更像是被嵌入系統中的一個「零件」。零件被安放進機器之中，機器再被納入更大的系統運作——這個系統，正是國家。

在這樣的結構下，治理是明確的上對下運作。與我過去在台灣所理解的社區治理或民間參與不同，這裡幾乎不存在「由下而上」的協商空間。無論是在校園管理、社區規範，或日常生活中的各種行政流程，風險與秩序往往由上層先行定義，而個人只需要被告知什麼是「危險的」、什麼是不被允許的。身分不是用來協商的，而是被分類、被標記、被管理的對象。這種治理邏輯，並非一夕形成。我在交換期間參與讀書會、閱讀相關文獻時，逐漸理解 1980 年代以來中國在回應全球化與現代化過程中，國家機器如何如同齒輪般運轉與耦合。這個過程既緩慢又充滿矛盾：一方面承認藏醫、蒙醫等不同文化的醫療制度的存在，另一方面卻不承認畢摩等地方巫醫知識；多元民族的分類從兩百多族被逐步收束為五十多族，並仍持續朝向唯一的「中華民族」敘事前進。文化在制度的咬合中被壓縮、被簡化，以利治理的可預測性。

這樣的邏輯同樣反映在教育現場。無論是論文寫作課或統計課，課程往往強調操作流程與技術標準，而較少引導學生去理解為何如此書寫、為何如此分析。學習被拆解為一套套可複製的 SOP，思考本身反而不是被期待的核心能力。

這與我在台灣研究所訓練中，反覆被要求說清楚「問題意識從何而來」的經驗，形成鮮明對比。

然而，這套系統並未因現代化而鬆動，反而隨著科技發展變得更加細密。手機、鏡頭、人臉辨識與各式數位足跡，構成另一層更即時、也更難以逃逸的身分管理網絡。人員進出校園與公共空間的辨識機制，使「被看見」成為日常狀態，而不是例外。這樣的治理經驗，也讓我重新思考自己原本關注的性少數與感染者議題。當性少數族群使用交友軟體必須面對實名制，當身分不再只是人際互動中的揭露選擇，而是直接連結到國家資料庫與治理系統時，個人還能如何管理、隱匿或重組自己的身分？在台灣，身分或許仍能透過人際關係進行策略性調整；但在面對高度整合的國家機器時，這些策略是否仍然有效，成為我在交換期間不斷反覆思考的問題。

回望這段交換經驗，我逐漸理解，自己原先試圖比較的，不只是台灣與中國在政策文本或醫療制度上的差異，而是兩種截然不同的治理想象：一種仍保留人際協商與制度縫隙，另一種則試圖將所有零件精確安放，使系統穩定運轉。在這樣的對照之中，我也更清楚看見，自己未來研究想要追問的，正是人在面對龐大制度時，仍能否保留行動、保留差異、甚至保留失序的可能。

這段交換經驗，讓我重新校準了自己原本的研究問題，也深化了我對「身分治理」與「醫療可近性」的跨地區理解。它不只是一次移動的經驗，更是一段迫使我重新思考國家、制度與個人關係的學習歷程。然而，隨著交換生活逐漸展開，我意識到自己所面對的「適應」，並不僅止於空間尺度、生活節奏或學習方式的調整，還包含一種更隱微、卻持續存在的心理狀態——對監視的感知，以及由此而生的自我審查。

在北京生活期間，微信幾乎是無可替代的溝通工具。無論是與同學、朋友，甚至旅途中臨時結識的人保持聯繫，所有互動幾乎都必須透過這個平台完成。也正因如此，我逐漸開始意識到，自己在對話中會下意識地避開某些詞彙、某些話題，甚至在按下「傳送」之前，反覆思考這段話是否可能被誤解、被截取，

或被納入某種我無法掌控的監控體系之中。

這種自我審查並非來自明確的警告，而是一種日常化、內化於生活細節中的不安感。它並不劇烈，卻長時間地存在，使我在與人交談時，始終保留一層心理距離。對我而言，這樣的經驗並不只是個人的焦慮，而是一種身處高度治理體系下，逐漸學會「如何安全地存在」的過程。

這樣的感受，也延伸到了移動與旅行之中。交換期間，我與其他交換生一同前往河北、西安、大同、敦煌等地，也曾獨自前往東北旅行。旅遊在形式上看似是離開校園、暫時脫離制度的時刻，但實際上，移動本身並未讓這層治理消失。無論是進站、住宿、購票，身分驗證與行程紀錄始終伴隨著每一次移動。對我而言，這些旅行不只是風景的累積，也是不斷在不同場域中，重新學習如何安放自己、如何與制度共處的過程。

也正因如此，這些旅途留下的照片，對我而言不只是紀念交換生活的片段，更是某種「仍能移動、仍能觀看世界」的證明。在高度被記錄、被辨識的環境中，能夠自由行走、與朋友並肩站在不同城市的土地上，本身就成為一件值得被記住的事情。

回過頭來看，北京的適應並非線性前進，而是一個不斷調整邊界的過程：調整自己可以說什麼、不說什麼；可以走到哪裡、又如何被看見。這樣的經驗，也讓我更具體地理解，在面對國家機器時，身分管理不再只是策略選擇，而是一種日常生存的技藝。



圖 1 交換的旅途紀錄